

20.04



梧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 纪念李济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组编



李济深先生遗像

目 录

深切的怀念·····	周泽棣 (1)
回忆李济深先生·····	李任夫 (2)
我所知道的李济深·····	张 威 (15)
我所知道的粤军第一师时代的李济深·····	李济准 (24)
关于李济深若干事·····	林伦彦 (30)
李济深给白崇禧的一封信·····	黄启汉 (40)
我所认识的李济深先生·····	徐铸成 (46)
关于李济深在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 时期的民主革命活动·····	李镇靖 (52)
抗战以来我党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及李济深 所起的作用·····	中共苍梧县委党史办公室 (66)
李济深游浮山即兴赋诗·····	(114)
李济深桂林书感三绝·····	(115)
惜别李济深将军·····	庆 燕 (116)
不平凡的宴会·····	敏 之 (120)

深切的怀念

周泽棟

今年是李济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梧州市政协特出版《李济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辑》以资纪念。曩者泽棟追随任公有年，得聆海益不少，谨缀数言，以表怀念之忱。

在风雨如磐之旧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李济深先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继而出师北伐，历膺重任，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唯以爱国救民为己任。

先生为邑之大坡乡人，出生于一个“亦耕亦读”的清贫的家庭，少年即萌发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嗣后在其一生躬身力行中，始终贯彻其初衷，因此受到人民的爱戴。

新中国成立，李济深先生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称赞李济深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民主革命者。

在李济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民革中央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李济深先生爱国家爱人民的民主革命者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工作竭尽绵薄，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

注：作者为梧州市政协副主席、市民革主任委员。

回忆李济深先生

李任夫

李济深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历史人物，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他一生的活动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流中前进的历史，是一页坎坷不平的记录。他从参加旧民主革命进入新民主革命，最后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他走过的脚印。他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中间的波澜起伏与是非功罪，人民自有评价，他自己也有自我批评。

我追随李先生多年，也参加过他一些幕内幕外活动。回忆在他左右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他谈过自己的生平往事。同时也了解到他的为人风度与进退出处大节，给我许多难忘的深刻印象。在此，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写出一些片段。

在1936年，我和宣侠父同志一道住在他料神村家中。他一次曾对我们谈到他在青少年时代弃文就武投笔从戎的思想感情，以及在抗战以前的一些活动。他说：“我生于几代书香之家，在青少年时，我的家庭也希望我仍走先辈老路，在科举上求功名。但我一到中西学堂之后，初步睁开眼光看世界，对于满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感到痛愤，认为要救中国，非推翻满清不可，要推倒满清，非用革命武力不可。我当时对于近在家乡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洪、杨为首的那些英雄人物，是赞仰不置的。虽然那

次革命运动失败了，然而这一幕可歌可泣的史剧，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烙印。所以在我十八岁那一年，未征得家庭同意，毅然决然投向陆军中学。我期望将来有朝一日，能以武力救国。在辗转进入陆大之后，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听到广东北伐军到了上海，我即满怀激情跑到上海去找姚雨平军长，参加了北伐的战斗行列。前锋已到了山东，不料正在此时，又闹成和局，结果被两面派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我伤心失望之余，只得又回广东军中工作。以后又继续到陆大学习。毕业之后，在陆大执教五年。当时看到北洋军阀官僚的所作所为，腐败恶劣，比之满清更有过之。我非常气愤，对国家前途，非常悲观。一线生机，只有寄托在南方以孙中山先为首的革命运动，所以1920年我借南返探亲之行，即留在粤军第一师工作，不再回北方去。

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将军，是我早年的战友，为人精明强干，他是拥护中山先生革命主张最力的人，但同时他又是陈炯明的参谋长。他坚决留我在第一师工作，从此我就坚决地走上了以孙中山为领导的旧民主革命的道路，一直拥护孙中山先生到底。以后由于孙、陈的矛盾，邓暗中接济中山先生生饷械，因而死于陈炯明的毒手。我对陈炯明是非常反感的。”谈到这里，他感慨、唏嘘。接着又说：“邓铿将军是我生平最亲密的战友，可惜竟如此牺牲。以后广东的政局，经过许多反复变化，在中山先生失败到上海之后，我也很灰心，曾一度辞职。后来中山先生派陈可钰来劝我，要我仍留在第一师工作，以待将来，我于是留下不走。几经波折之后，我终于掌握了第一师，加以重整。以后即和滇桂军合作，将陈炯明打败了。中山先生方重回广东组府，下一步即

为统一广东而战。同时还协助广西李宗仁消灭了旧桂系的残余，肃清了南路和东路反动武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为以后北伐打下基础。不幸的是，中山先生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但在中山先生去世之前，已改组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实行三大政策，得到苏联的援助，当时革命的空气是很高涨的，直到后来举行了北伐。”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在北伐中，我是第四军军长、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还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我以代行总司令职权留守后方，派陈铭枢、叶挺等参加北伐。在支前方面，我还是尽了很大责任的。不料在北伐中途，发生了国共分裂，我当时因认识不够，作了蒋介石的尾巴，从‘清共’到与共军作战，我都参加了。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无疑是使革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这一转变，我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每一想到，深为内疚，对不起人民。由于这一转变，致使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在谈到北伐以后的情况，他也作了概括的回顾。他说：“由于蒋、汪、胡的三角斗争，和蒋介石的独裁，以政争发展成为长期的内战，这种反复过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的立场，总是希望国家统一，团结对外。在北伐告一段落，召开编遣会议之时，我已看出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决心。我以国事为重，一再向他进言，不要再走内战之路，只要他做得对，我还是支持他的。例如他在第一次下野时，我还派刘裁甫要他回来。在宁汉对立中，我是主张蒋汪合作的。谁知汪精卫为人反复无常，他回到广州之后，用调虎离山之计，将我骗走，结果造成广州反复争夺，最后又演成粤桂战争。从

此蒋介石更进一步消灭异己，实行其削藩政策。首先向桂系开刀，并双管齐下，把我也搞下台来，以遂其一石两鸟之计。而我并非桂系，在罢免鲁涤平问题上，我还去责骂李宗仁。当时我为阻止内战，作为调人到上海之后，明知蒋介石阴险毒辣是不择手段的，李宗仁也一再劝我不要去南京。但为了大局，我不顾个人利害，以跳火坑的精神，企图作万一的挽救，结果是我被扣，反而实现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目的。但问题并不由此结束，结果更是延长了内战，并导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成了替罪羊，整个东北沦陷了，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我要蒋介石‘下诏罪己’，他不肯，但国难当头，他不能不与各方面妥协。蒋在压力之下，又被迫下野。我恢复自由之后，改组政府由孙科主持，我也参加了。可是蒋介石却在背后捣乱，不支持孙科，他想卷土重来。我和冯玉祥是支持孙科的，想在中央组织一次会来援助他。蒋介石一闻此讯，便马上又和汪精卫勾结起来。汪蒋狼狈为奸，积极活动。当时陈铭枢是京沪卫戍司令，握有兵权，如果听我的话，蒋、汪是不能上台的，可是他反和蒋、汪妥协，自己当了交通部长、行政院长，这是我很不满意的”。

在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问题时，他的议讨很多。李先生说：“蒋汪上台不久，即爆发了上海‘一·二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之后又一次侵华军事行动，十九路军驻在此地，自有抗战保土之责，何况人心激愤，万众一心。但蒋介石丧心病狂，对于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行动，不仅不予援助，反而派第五军去监视，当然激起第五军官兵的义愤，结果是不执行蒋的命令，

参加抗战，蒋介石也无可奈何。淞沪停战之后，十九路军撤到苏州，当时中央政府迁到洛阳，国民党召集会议，结果推汪精卫作行政院长，蒋介石成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种争权夺利的分赃行为，激起我和冯玉祥的大怒，我们即离开了洛阳，蒋介石为所欲为，又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以自己嫡系部队来驻防。在这种情况下，十九路军为了救国，为了自救，都不能不打开出路。我原想打回广东去，消灭陈济棠之后再组政府。蒋介石一闻此讯，就派机接陈铭枢去，企图分化。我们将飞机扣留之后，为紧急应变，在全国人民惨痛呼号之下，不得不马上举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当然，事起仓卒，发动前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但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军队腐化变质、基础不好。同时内部又出了内奸与各方面的联络，也因为我们一些改革主张，各方面都有怀疑，不肯积极响应。所以我们发动之后，广东、广西、湖南各方面，都意存观望，而胡汉民等还发通电反对我们，西南政务委员会也是如此。我们和中共方面虽有联络，因变化不快，行动配合不上。而发动民众和土改工作，也未做好。所以很快就失败了。我们为了抗日救亡，不得不与蒋介石继续斗争。所以我们一到香港，即组织民族革命同盟。一方面推动各方面抗日，一方面我们也建立了一些地下武装。在黄浦同学方面，也发展了秘密组织。这种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了推动反蒋抗日作用。”

最后，他又谈到两广的“六一”运动问题。那时，已是在蒋桂妥协之后了。他很感慨地说：“李德邻（宗仁）、白健生（崇禧）不能坚持到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以当时的形势而论，只要联合共产党和各方面反蒋抗日势力，同时大

力发动民众，前途是大有可为的。”回忆当时，我也是奉李先生之召从日本回来参加反蒋抗日的，宣侠父同志是来汇报、请示工作的。在蒋桂妥协问题上，我也不满意桂系之所为，因此拒绝了李宗仁派我的工作而一意追随李济深先生作反蒋抗日的地下活动。李先生派我担任贵州改选同志会政委会的主任委员。广西当初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的，一方面与蒋妥协，一方面秘密接济李先生的反蒋抗日活动，但不久即停止接济了。所以李先生当时的经济活动相当困难。当时王亚樵一般人在梧州，几次想制造伪币来支援李先生，但没有成功。这是我和王亚樵一般人多次联系决定的。可是李先生的革命勇气，并不因此而动摇，仍然大力进行民族革命同盟的工作。直到“七·七”全面抗战后才停止活动。

当西安事变之前，李济深先生已积极和各方面联系，包括中共和张学良方面。他看到蒋介石调兵遣将想进攻中共的时候，忧心如焚，曾与李宗仁商谈，如何能扭转这个局势。但李宗仁等是反蒋也反共的，采取消极态度。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李先生非常兴奋，以为时局大有转机。他是积极支持张学良的。除通电申斥蒋介石外，还提出几项具体主张：一、对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组织统一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四、将攻击西安事变的中央军，从速转移，调赴绥远抗日前线等等。

“七·七”抗战爆发以后，李济深先生正在梧州。蒋介石来电请他到南京去共商大计。李宗仁有电请他到桂林去商量。在白崇禧去南京之后，接着李先生也到了南京。他和蒋会见时，表示要他尽力协助，但蒋从不把军政实权交给他，

只发表了一个空头名义。为了救国，他不计较这些，恳切向蒋建议，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同时要发动民众，展开全民抗战。蒋介石只是唯唯应付，自行其是。当时陈铭枢一般人，早已到了南京，关于革命同盟的存在与解散问题，内部意见不一。李先生是坚决主张保留的，而陈铭枢为讨好蒋介石，却坚决主张解散，以表示团结之意。结果同盟解散了。这是李先生很不满意的。他曾对我说过：“陈铭枢此举，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可是蒋介石对于陈铭枢成见很深，在抗战八年中，蒋对他始终冷淡，这是后话。在这段时间，李先生曾到前线视察，又衔命到山西去与阎锡山商量军事。上海战争失利以后，南京紧张。李先生转移到武汉来，随后蒋介石也来到武汉。当时武汉的政治空气是很高涨的，各党各派的民主人士，都纷纷到武汉来，陈诚还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但同时蒋又在进行秘密和谈，谣言很多。而汪精卫之流，又在破坏抗战，李先生很气愤。后来李先生移居东湖疗养院，许多民主人事和将领都来看他，希望李先生对蒋有所匡正。于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介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坚持抗战到底，决不能中途妥协；一是起用抗战派，改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并建议组织最高国防会，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白崇禧等抗日派来主持。我是看过此信的。事后蒋请他吃饭，但对此信并无表示。可是蒋介石仍在实行其孤家寡人的路线。记得陈诚来看他，李先生对陈诚说：“你要劝蒋先生，一不要怕共产党；二不要怕民众；抗战前途才有希望。”陈诚也向李先生提出建议，希望李先生能担任沦陷区的工作，将来设一机构，由李先生主持。不久即召开南岳军事会议，我必提出云云。以后李先生

转到衡阳去住。但在南岳会议时，并未请李先生参加。事后得悉，陈诚在会上确已提出，然为孔祥熙、陈立夫等所极力反对，而白崇禧也不极力支持，因而搁浅。

当以叶挺为军长的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先生将他在同盟时代所联系的地方武装，希望他们编入战斗行列，参加抗战，派我与叶挺接洽。叶挺是欢迎的。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核示，结果被蒋介石拒绝了。这件事使李先生非常气愤。为了抗战前途，他认为不打破蒋介石包办独裁的局面是不行的。但要打破这种局面，靠个人的建议也是不行的，必须策动各方面的力量，向蒋施加压力才有办法。于是特约谭平山、徐谦、陈铭枢、徐景唐等到衡阳商讨意见。当时徐谦正在因患肺病动手术之后，陈铭枢已去四川，只有谭平山，徐景唐几个人到来。商讨结果，由谭平山起草一个纲领，首先是改组行政院，把孔祥熙拉下马来，再建立抗战联合政府。李先生将方案带回桂林之后，又和黄旭初商谈了一下，随后自己写了十几封亲笔信，并拟定了密电码，即派我到四川去策动。其中就有致叶剑英同志的一封信，由我面交。我秘密到重庆之后，和章伯钧住在一起。先后和陈铭枢、熊克武、但懋辛、吕超等交换了意见，即去看叶剑英同志，不料他刚回延安，而博古到来，于是我和博古长谈两次，王明也约我同章伯钧去作了一次长谈。博古对我表示，待请示延安后再进一步商讨。（给叶的信由博古转去）

我在重庆的活动告一段落之后，由川康绥署办事处派车送我去成都，唐午园（解放后武汉副市长）陪同我去。到成都以后，与邓锡侯、潘文华、傅真吾（刘湘的参谋长）、张斯可、刘亚琳、以及刘文辉的代表邵石珩，龙云的代表李云

谷等人作了几度密谈。连李宗仁的代表温乔生也参加了。经过协商之后，他们一致拥护李先生的主张，只是通电的问题，再向李先生请示。我立将一切情况电告李先生。恰在此时，蒋介石、吴稚晖也有电给李先生，说中央拟设一政治局，请李先生主持，李先生对此无表示。不料陈诚突奉蒋介石之命来桂林，将李先生拉到重庆。李与蒋介石会见之后，蒋表示一定要他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但并非政治局，李先生当时不肯接受。当电我由成都回渝时，而冯玉祥王葆真却力劝李先生担任此职。几经研讨，最后向蒋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在人事阵容方面，一定要不分党派，兼容并包；一是请蒋自己担任主任委员，他以副主任代行。蒋介石答应之后，才决定就职。蒋介石表面上表示，一切由李先生负责，决不干预，如有困难，仍当协助。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人事上说，不仅将重庆行营撤销后的全部人马交付使用，而且在党务和军事两组，都派了他的心腹李宗黄、晏道刚担任。此外，还用特务手段进行秘密监视。同时工作上又处处受到中央党部和行政院的掣肘。所以虽在抗战中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蒋介石所以不放手让李干，是怕李利用党政会来反对他而已。

在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之后，蒋更借此将李先生调去桂林当办公厅主任，另派程潜来继任，但李先生也感到摆脱了蒋的压力。当时的桂林，很多民主人士集中在那里。政治空气比重庆自由得多，但蒋介石的特务，仍暗中活动。不过在李先生掩护之下，使其不能太横行无忌而已。在这段时间，李先生保护过一些民主人士脱险（如梁漱溟、邹韬奋等），也保护了一些进步刊物书店（如三户书店

等)。他自己和民主人士很接近，也参加了民主活动。对政治上提出许多批评。因此，又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另外，由于桂林办公厅所辖范围内，如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都是拥有实力的旧部，蒋介石更怕他们联合起来，造他的反，于是又将桂林办公厅撤销了，调李先生到重庆去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明明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李先生当然不肯上当。他便决心摆脱一切，在广西组织民兵武装。由于械备缺乏，他曾派人和史迪威联系，请史在美械分配上给以援助，以便配合美国登陆时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史氏的答应。后来因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尖锐化，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撤换史氏。蒋介石是统帅，罗斯福只好照办。结果史迪威被调走了，而李先生的计划，又告落空。

桂林陷落之后，李先生回到梧州去做发动民众的工作，一方面约一些民主人士到他家乡去共策进行；一方面与中共的地下武装取得联系，相互支援。这一段活动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因为我当时尚在息烽集中营中，未能参加。这是我在恢复自由后到重庆与李先生重聚时，他对我谈到的。他说：“这一段工作有三大阻力：一是蒋介石对我防范很严，曾派人到戎圩来暗杀我，幸而及早发觉将凶手抓获；二是广西地方的顽固势力反对我与共产党合作，多方阻挠，说我是半边共产党，如果接受我的主张，广西地区变成陕甘宁第二，而且还有人阴谋杀害我，可见处境之难；三是物质上的困难，无论军械和经济，都感到不足，虽然得到党的地下游击队以及东江纵队的一些接济，仍难以应付，但我们积极进行。在日本投降之前，我已和蔡廷锴等组织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国内政局又面

临一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旧政协召开后，形势一变，我以为民主有希望了。孙科来到广州，我自己也到广州去，领导民主促进会的工作。国民党又召开三中全会，我是中央监委，当然要来参加，所以才和张发奎到重庆来。想乘此进一步扩大民主运动。”

当时的重庆情况是：一方面民主气氛的高涨；一方面是反动逆流的猖獗。两者已到了短兵相接的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正在酝酿内战。而蒋介石自己，在参政会上、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其反动面目更为露骨地表现出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已决心走内战的道路了。为了阻止这一段逆流，李先生和孙科、冯玉祥、陈铭枢等作主人，特别宴请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原想推孙科出来带头，以与反动派对抗。不料这个软骨头竟把一切情况告诉了蒋介石。因此，这次民主活动又告流产，结果只组织了一个三民主义同志会。

不久，大家又都回南京。这时，正是马歇尔七上庐山，蒋介石用边谈边打以作缓兵之计。同时大规模向东北进军，最后谈判终于破裂。李先生当时已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由董必武同志给他七百万元巨款，作为策反国民党军队之用。他已分头派人进行。为了推进工作，自己也想去北方一行，但为陈诚所阻。而蒋介石也三次电请他到庐山去商谈。他虽知道前途不妙，但还想借此机会向蒋介石面谏，希望其悬崖勒马。但几次面见，都未能深谈。最后只得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给蒋介石，批评蒋的政策与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所谓训政，不过训出大批特务来到处横行而已。结果必然是愈训愈失去民心，自己也不堪设想云云。但蒋介石不

答复，而内战日渐扩大。李先生不能再呆在庐山了，即借儿子出国为由，仍回南京。此时中共正想找房子作办事处，他便想将自己的房子租借给中共。国民党一闻此讯，马上以一亿元将他的房子租下来，以抵制中共。此款即作为他以后的活动费。同时蒋介石为了压制民主，将冯玉祥解除军职，强派他出国考察水利。冯行前曾与李先生联系，约定在国内外分途发动民主反蒋活动。

在冯玉祥出国之后，李先生为活动方便，先搬到上海去住。在这段时间，他先后和马叙伦等会谈，如何集中力量，开展民主运动。随后，于1947年，他转去香港，大力开展工作。一面集合在港民主人士，一面派人回到内地联络。同时和中共更为具体配合。于1948年元旦，即组成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先生被推为主席，发表了宣言和纲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9年春，应中共的邀请，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同到解放区，参加了政协和政府，继续领导民革，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统一祖国而奋斗，直到他停止了呼吸。

回忆我从1948年奉命派回内地做策反工作，解放以后，于1950年到京与李先生重聚时，他不止一次对我谈到：“为了革命救国，我在前进的道路上，迂回曲折地走了几十年，最后才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只有拥护共产党才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但在他生前并没有达到，不幸抱志以歿。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而且超过了他的理想。中山先生在天之灵，亦当感到慰藉。我作为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能躬逢其

盛，并且承蒙党和人民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我自己谈不上贡献，而且在我的历史上，还犯过很严重的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我感到兴奋、惭愧。今后只有跟党走到底，以报答党和人民。我们国家已站起来了，洗雪了百年的耻辱，我相信，今后必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生之年，我一定竭尽所能，起一点应起的作用。”这一番话，是李先生的最后誓言。对此，他是以革命的实践贯彻到底的。

（原载河北文史资料）